

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

赵 辉

[摘 要] 歌与诗起源于不同的言说时空。歌源于原始人类自由的言说,诗则起于西周集居住、行政、宗教祭祀于一体的宫廷政坛的“限定言说时空”。不同的起源,决定了歌与诗不同的原始功能:歌的本质是音乐,更多用于个体的抒情言志;诗的原始本质是一种政治工具,其原始功能限定在政治的歌功颂德与讽谏。

[关键词] 歌;诗;起源;功能;异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6-0742-05

先秦歌与诗的异同,学者在研究诗的起源时也有论述,多认为歌与诗不仅同源,而且功能相同。我们认为,诗是礼乐政治形态的产物,在起源及其原始功能上与歌有着极大的差异。

一、歌的起源与本质特征

歌当早在人类有初步语言能力之时就已产生,但“歌”这一概念的产生则晚得多。商代之前有没有“歌”的概念不得而知,早期的歌是否称为“歌”也是值得商量的。《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从“歌八阕”看,这八阕必有八段歌词。《周礼·大司乐》载舞《云门》时要歌大吕,舞《咸池》时要歌应钟,等等。歌大吕、应钟等即是说歌诗合大吕应钟之调,可见《云门》、《咸池》原本有歌词,但它们都名之为“乐”。这些歌不以诗、歌名,说明远古时期没有“歌”的概念,“歌”称为乐。

“歌”的概念大概最早产生于商代。金文中有不少“歌”字出现。甲骨文和金文释读的字已有数千,却无“诗”字,《易经》亦不见“诗”字。据此,朱自清认为“诗”的概念“大概是周代才有的”^[1](第10页)。知商代有“歌”而无“诗”。从“歌”、“诗”概念产生时间的先后看,歌为诗之源似乎也无疑问。但是,若诗与歌没有区别,也就不应有“诗”的产生。故“诗”的产生说明歌的要义也就不适用于诗,诗的本源不在“歌”。

根据文化学资料和战国以前的歌,可以看出歌的本质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歌的本质是音乐

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而不是文字。格罗塞考察了许多原始民族的原始歌谣后说,“原始民族用以咏叹他们的悲伤和喜悦的歌谣,通常也不过是用节奏的规律和重复等等最简单的审美的形式作这种简单的表现而已”^[2](第176页)。“为了旋律的缘故,往往把辞句改变或删削得失了原意。”^[2](第214页)因而,早期的歌,音乐较文字有更重要的意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虽有文字表意,但文字的意义并不重要。

歌的音乐本质,使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向宗教渗透的强大功能。音乐能起到愉悦人的作用,故人们也想以音乐去愉悦神灵,求得神灵福祐。故原始宗教产生后,歌被当作通神工具广泛地使用着。但也正是在宗教礼乐形态,歌的音乐性质和功能逐渐减弱,文字的表意功能不断加强。在祭神时,歌乐不仅为着娱神,更重要的意义是与神灵沟通。音乐旋律能传导喜怒哀乐,却难表述具体要求。而祭祀具有强烈

的功利性,总是要达到某方面的目的,如获得猎物等。音乐不可能表达人的这些意愿,而只能借助语言。故歌成为通神工具后,对文字便有了一定要求。《周颂》有对神灵的赞美,也表现着对神灵的希望和期待。如《维天之命》赞美文王“之德之纯”,《丰年》祈求“降福孔皆”。歌的交流功能要强化,语言在歌中的地位也必然得以加强。我们虽难找到西周前的祭神歌辞,但文化学资料告诉我们,以语言来达到与神沟通的目的在祭神中具有重要意义。《周颂》中歌辞最少的《维清》也有五句,用于春天籍田而祈社稷的《载芟》则达到了31句。从《周颂》看,当时人们祭神已充分注意到了语言在祭祀中的表意作用。

不过,由于人们更多是凭借音乐和神灵沟通,音乐在原始宗教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语言交际功能在宗教歌乐中的增强,并不意味着音乐性能和抒情功能减弱。所以,《周颂》的文字空间都比较小,多在十句以下。先秦的歌,虽也有如《五子歌》,文字较长,但绝大多数文字空间都较短小,如《梦歌》、《华元歌》等,少则一两句,多则四五句。这种情况,更多地体现着原始歌谣的音乐本质特征。

(二)歌具更多“非限定时空”言说特征

战国之前的歌,虽也有些带有“限定时空言说”特征,如用于祭祀场合的祭歌、《五子歌》、《冻水歌》等,都有着特定言说场所,即朝廷;主体有特定的言说身份,即朝廷官员;有特定的言说对象,即君主;也有特定的言说关系,即君臣关系;但更多是“非限定时空”言说。诸如《麦秀歌》、《采薇歌》等,虽言说主体的身份是官员,但不存在特定的言说场所和对象,当下的主体作为相对自由的个体而存在,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自己的官员身份。百姓之歌,虽也有些言及政治,但基本上都是“非限定空间”的言说。非限定场所、非限定言说对象、非限定言说关系使得主体始终保持着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而不受“限定言说时空”的制约,主体在“言说什么”和“怎样言说”方面都有着充分的自主性。因而,这些歌虽也有涉及政治,但更多的是百姓对于政治、生活各方面的个人感慨,具有较强的抒情性。结合歌者百姓居多这种情况看,歌是一种普及性的表达意愿的形式。

(三)歌具口语性质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去其重复,战国之前的歌约52首。其中,非口语的20首,其中骚体9首;纯四言9首,其中非口语8首;口语及有口语成分的32首,其中杂言27首,这27首中为口语及有口语成分的26首。这说明歌多是即时即事而唱,作者不可能先写出歌词,再用来与人沟通。《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齐庄公歌》:“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都如口语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歌只有11首为《尚书》、《左传》、《论语》所载,其余均载于战国中晚期和汉代典籍,不排除那些非口语的四言及骚体有后来文人加工的可能。可见歌更多以具有口语性质的杂言出现,是口头文学。只有那些用于原始宗教仪式的歌,可能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二、诗与寺

“诗”的概念的产生,不少学者从语源学角度作过探讨。杨树达《释诗》认为,“诗”由“言”与“寺”构成,“古文作,从言,声,按志字从心,声,寺字亦从心,声,志寺古音无二”,可以通假,故“诗即志”。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提出“志”即“诗”,具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义。叶舒宪从语源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诗”的本义考察,认为“‘寺’的本义指主持祭仪的祭司或巫师”,“‘诗’原本是具有祭政合一性质的礼仪圣辞”^[3](第147,157页)。刘士林认为寺“最核心的功能,乃是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分配与食物分配这一原始功能”,寺“集上古社会的政、教、兵、农于一身”,“从某种角度来说,‘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明堂’”^[4](第125-126页)。虽未明确说“寺”与“诗”如何关联,但肯定了“诗”从“寺”这里获得了本体内涵。

应该说叶、刘都已接近了“诗”的源头和它原始本体内涵,却又失之交臂。其实,“寺”原非主持祭仪的祭司或巫师。叶舒宪引王国维、陈梦家等甲骨文学家对“𠂔”的考释云,“𠂔”在卜辞中与“又”同,“𠂔”、“又”在卜辞中都为祭祀,应当不假。但是,“𠂔”、“又”不仅是祭名,亦是祭祀的方法和地点。反过来说,在一定地点、用一定方法举行的祭祀必是某种名称的祭祀,如禘祭在宗庙,社祭在社,祭雨在舞雩。因而,“𠂔”、“又”最早也当是指祭祀的神坛。寺从“𠂔”从寸,原本当指祭祀的场所,即神坛。王逸《楚辞章

句·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注云:“得升五帝之寺舍也。”同书《九怀》注“河伯兮开门”曰:“水君俟望,开府寺也。”知汉代还将神灵集止的场所称之为寺。《说文》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明确指寺为场所而非职位。故说“‘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明堂’”,更近历史真实。

但随着社会发展,“寺”的性质和功能也有较大改变,即“寺”不再专指神坛,而是指帝王集居住、行政、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建筑,夏商都邑宫殿已是如此。宋镇豪说:二里头夏代晚期都邑遗址最高一等的是大型宫室建筑,其中三期一、二号两座基址是主体宫室,正殿建筑在高 3 米的高台上。一号宫室坐北朝南,正殿前的大庭可聚万人,适合颁布政令,类于文献说的“夏后氏世室”。其东北方 100 多米的二号宫室,正殿后居中的陵墓与正殿、中庭、门塾自北而南呈中轴线摆开,具有后世寝陵制的雏形。墓前的正殿三室并联,类于《尔雅·释宫》所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正殿之中室似为庙,可能用于供奉墓主及先王神主,为举行祭祀之所;东西两室似为寝,为放置祖先衣冠、生活用具和供物之所。知夏代“上层贵族集团的居所已合居住、祭祀、行政于一体”^[5](第 35-38 页)。周代的宫殿建筑承袭了这一结构。《考工记》载,周天子居住之地为明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明堂不仅具有居住和行政的功能,而且也立有神坛,是举行祭祀的地方。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知周代最高统治者的宫殿是集居住、祭祀、行政于一体的。

神坛建筑在高位,具有无比的神圣性。夏商周三代,神坛进入最高统治者的宫殿,与行政场所融为一体。且周代的礼乐制度以原始宗教礼仪为实践形态,原始宗教礼仪依然在周代礼乐制度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如《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宫廷承担了原始宗教之“寺”的全部功能,于是,这最高统治者的宫殿建筑也被称之为“寺”;故《说文》训“寺”为“廷”。先秦,廷一般专指国家行政场所,如《左传》襄公三十年“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过诸廷”,《国语·楚语下》“斗且廷见令尹子常”。故有朝廷、宫廷之语。《周礼·寺人》载:“寺人掌王之内人。”将掌管王室内宫的人称为“寺人”,传出的都是称宫廷为“寺”的信息。《管子·度地》有“官府寺舍”之语,《考工记》郑玄注“外有九室”谓:“九室如今朝堂诸曹治事处。”管子“官府寺舍”连言,说明管子时人们以宫廷为“寺”。《周礼注疏》卷三:“宫正”条郑注云:“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八“寺人”条谓:“度数所自出而求度数者之处谓之寺。”明确称宫中的官府为寺。汉代中央很多机构也称为寺,如卫尉寺、侍中寺、黄门北寺。《晋书·荀勖传》载咸宁年间荀勖建议将原九寺并为尚书。《资治通鉴》卷八〇胡三省注谓“《晋纪》二以九寺并尚书”云:“九寺,谓九卿寺也。”知汉代将九卿的官署称之为“寺”,而“九寺”即由周代宫廷的九室发展而来。故《说文》说“寺”为“有法度者”。

寺最早为纯宗教的祭神场所。夏商两代,寺虽集居住、祭祀、行政功能于一体,教政开始融合,但那时的礼乐仅为祭祀仪式规范,没有和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统治者只不过是利用掌握的祭祀权来强化政治的权力,而且仅用于人神关系言说,本质是宗教的。到周代,周公制礼,将原始宗教礼仪和嫡长继承制融为一体,转化为一种政治制度,虽同为礼乐,但周代政治礼乐形态的礼乐却与原始宗教形态的礼乐有本质不同。周代政治礼乐形态的礼乐不仅用于祭祀,也用于政治的各个方面,且由于祭祀为政治制度的实践形态,规定着等级、权利,用于社会人际关系的表达,本质是政治的。因而,当作为宗教祭祀之所的“寺”转化为君主居住、祭祀和行政之所的“寺”时,“寺”也就完全转化为政治机构。

“诗”的概念产生于西周,如果是说“诗”为在寺之言,“寺”为那时集居住、祭祀、行政于一体的宫廷,那么,最早的“诗”当然不会是纯宗教的产物,“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的言说的产物,与歌不同源。

三、诗与歌

诗虽是西周礼乐政治的产物,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

诗作为在国家中央政治机构之“寺”活动的产物,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限定时空言说”而存在,很少带有歌作为“非限定时空言说”的特征,也就是说,作为在国家中央政治机构之“寺”这一“限定时空”言

说的诗,一开始就被限定在政坛言说范围之内,言说主体的身份被确定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不像歌也能让平民百姓用去抒发个体情意。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从邵公的话看,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我们注意到,尽管时人认为音乐的节奏旋律有一定的表意功能,如《乐记》说,“嗔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能见出百姓“康乐”,“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但诸如歌德讽刺都是音乐旋律所不能胜任的。而《诗经》的《大雅》《小雅》主要为言事,为歌德和讽刺。马银琴说“西周早期的‘诗’是指规正人行的讽谏之辞”^[9](第220页),以为诗原本承载的是政治功能,是有一定见地的。

诗要用于歌颂功德和讽谏的政治言说,便需要较大的文字空间。所以“二雅”一般篇幅都比较大,《大雅》40句以上的诗就有20首之多,最长的《抑》有114句。这说明,要承担政治功能,则必强化文字的功能。可知礼乐政治形态言说的实用性,使得诗借语言文字表意的功能大大加强。也就是说,政坛言说主要借助文字来进行。

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周礼·大司乐》载,周代有乐教的政治措施,大司乐“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乐教分为乐德、乐语、乐舞三方面。乐德即其所说的中、和、祗、庸、孝、友等礼乐伦理道德,为“乐”的本质,乐语为乐德的表现形态。一般的歌虽有音乐性质,但一般的歌所具有的“音乐”却非礼乐之“乐”,不一定承载礼乐等伦理道德,不能用于乐教。诗为政坛这一“限定时空”君臣关系的政治言说,是礼乐政治的产物,体现着礼所规定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与一般的歌所体现的情感价值取向不同。《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是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体制短小,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更为重要的是,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一开始最主要的作者应是朝廷的官员外,最为重要的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份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诗虽是西周政治礼乐形态的产物,但周代礼乐的政治本质并不影响它对原始宗教形态礼乐的继承。周代的礼由原始宗教祭祀礼仪发展而来,与夏商之礼仪不同的是在祭祀礼仪中融入了血缘、等级的核心元素,用来规定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等级权益。还有周礼增加了诸如射礼、燕礼等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虽然周礼是作为政治制度出现,但这制度却在很多方面借原始宗教祭祀礼仪来规定,原始宗教礼仪是这种政治制度的重要实践形态。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指的就是祭祀礼仪的相承性。因而,周礼在祭祀礼仪形式方面对夏、商并没有多少改变。

周礼中祭祀礼仪对原始宗教礼仪的继承,赋予了周礼的神秘和神圣性。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这一形式的使用,一是借助音乐赋予诗以神圣性。因为乐不仅有着通鬼神的功能,而且,作乐必是有大功德的圣人。西周的人极崇拜周以前的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等,是因为它们都反映了尧舜这些圣人的大功德。如《周礼·大司乐》郑玄注云:“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多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

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殪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二是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因为诸如“二雅”中的那些较长的诗，不可能是即时的创作。

四、余 论

西周至战国早期，除《诗经》，歌很少被称为“诗”的。《诗经》曾收入了不少的歌，《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谗”。《国风》可能原也更多为歌。这一情况，反映着“歌”与“诗”观念的合流。这种合流大概始于周宣王时期。宣王中兴，不仅是说行政权力重归王室，亦是说礼乐在这一时期有大的发展，所谓“采诗”大概就始于宣王时。但“采诗”只不过是后人的说法，那时所采，当更多的是在一些诸侯国流行的歌曲。这些歌或原本具有讽谏的作用，或通过诠释赋予了它们政治讽刺的价值蕴涵，故在后来《诗经》的编辑时被收入，归入“诗”的范畴。但诗与歌原始概念的涵义，并没有随着这种合流而马上消亡，在人们的观念中还始终占有一定的位置，故那时人们很少将“诗”称为“歌”，也很少将“歌”称为“诗”。

[参 考 文 献]

- [1] 朱自清：《诗言志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2] [德]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 [3]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4] 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 年版。
- [5]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6] 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Origin and Primitive Functions of Songs and Poetry

Zhao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 Songs and poetry do not share the same verbal origin in time-space. The former comes from the political speech in the royal courts of Xizhou Dynast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union of residential, administrative and religious sacrifice-offering ceremonial functions while the latter evolves from the free speech of the primitive man.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origins, songs and poetry have different primitive functions. Songs are music in nature, and as such they are used for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motions and ambitions. As a political tool in nature, poetry has a primitive function of eulogizing the virtues and achievements of political leaders as well as satirizing and admonishing them.

Key words: song; poetry; origin; functi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